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23.02.013

“以道驭术”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价值映射

蒋勇

(江苏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用“中国话语”构建本土工程伦理教育体系是传统科技思想价值反映的重要方面。“以道驭术”科技思想的价值可以由当代工程伦理教育的需求决定。“价值映射”为建立“需求”和“价值”间的决定性关系提供指向性表征。定义“以道驭术”思想元素构成的“供给集”以及工程伦理教育需求元素构成的“需求集”,分析“道德跃迁”对应法则,验证了两集合之间“价值映射”关系的合理性。“价值映射”的作用在于将“个人品德修养、共同体间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传统元素”融入当代中国工程伦理教育,发挥工程伦理教育在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显性功能,即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使中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为有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提供人才支持。

关键词:以道驭术;科技伦理;工程伦理教育;道德跃迁;价值映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348(2023)02-0174-07

Value mapping of “Controlling Technology by Tao” i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JIANG Yo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local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value mapping of tradi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hought. The valu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hought of “Controlling Technology by Tao”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needs of contemporary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Value mapping” provides directional represent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deci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and “value”. The “supply set” composed of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Controlling Technology by Tao” and the “demand set” composed of the demand elements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were defined, the corresponding rules of “moral transition” was analyzed and the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valu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ts was verified. The role of “value mapping” is to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to contemporary Chinese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plicit func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under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ideas and China’s realit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Chinese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vide talent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solving China’s local problems.

Keywords: Controlling Technology by Tao;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moral transition; value mapping

工程是负载价值的人类实践过程,工程实践主体在处理“为人类谋取最大福利”与“现实利益”关系时,理应将伦理制约作为价值判断的一种内在维度。^[1]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收稿日期:2022-07-27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专项课题支持项目(2021JDKT023);江苏理工学院 2021 年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1161131212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政专项(2022SJSZ0602)

作者简介:蒋勇(1985—),男,江苏常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科技思想与工程伦理教育。

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梳理科技运用及工程实践过程中的规范与道德逻辑,并对工程伦理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工程伦理教育始于西方,但工程伦理产生于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系列科技伦理思想,尤其是作为阐释“道德”与“技术”关系的“以道驭术”观点在古今科技伦理的探讨与实践中具有深远意义。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下,如何将中华民族传统科技伦理思想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构建基于中国文化境域和工程发展现状,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思想领域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增强科技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传统思想文化价值重塑及工程教育关注的重点。^[2]通过构建“以道驭术”思想的“供给集”与工程伦理教育的“需求集”,在对应法则“道德跃迁”的作用下,对“价值映射”进行表征,将“个人品德修养、共同体间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传统元素”融入当代中国工程伦理教育,为工程教育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

一、“以道驭术”的“供给”与工程伦理的“需求”

(一)“以道驭术”思想的“供给”

“以道驭术”是我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关于“道德”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及思想观念的整体概括。这里的“道”,从研究语境看,指道德^[3],是以善恶为评价方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的行為规范的总和,因而具有“道德”的普遍意义。然而,这种“行为规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调整,还超越个体性和主观性,对“我会怎么做”这种个体意识进行反思,即从社会性和客观性视角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因此,与普遍意义的“我的”道德不同,“以道驭术”之“道”是一种体现“集体伦理”之“道”,是汇集社会“共同体”的“人类”的道德。“术”指和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技术活动,如制陶、冶铸、沟洫、烧荒等。“驭”指驾驶马车,引申为驾驭、控制。“以道驭术”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的驾驭和制约。^[4]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以道驭术”的理解和把握各有侧重,最具代表性的有儒家、道家和

墨家。这些思想观点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综合中国古代思想家观点,可以提炼“以道驭术”所蕴含的三点核心要义,即能够满足当代实践需求的思想“供给”。

一是关注“义”和“利”对社会的影响。儒家侧重科技的社会效果^[4],强调技术的使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认为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百姓福祉的是“善”的技术,反之为“恶”的技术,把“善”与“恶”的关系判断建立在宏观的社会效应上,本质上是儒家“仁爱”精神内核在社会生产上的集中体现。《论语·述而》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人的一生应该是志向在于大道,根本在于德行,依仗在于仁爱^[5]。“道”与“仁”是一切实践活动产生社会效果的关键。《孟子·梁惠王上》表达了“重义而轻利”的思想^[6],反对只图一己之私利,要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利。儒家把科技的使用置于“义”和“利”的天平之上,在“义利”的取舍间调整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此告诫后人技术的使用应对国家社会有利,而非只为私利。

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道家所谓之“道”比“道德”的内涵更为宽泛。“道可道,非常道”,道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是超越技术与经验之上的规律、规则等,具有本体论意义。“以道驭术”之“道”,虽为“道德”之义,仍属道家之“道”范畴^[1]。道家追求“道”与“术”的统一,“技”要顺应“道”,终归“道法自然”。与儒家不同,道家更突出人与劳动工具、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庄子·天地》云:“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国君治理天下要以德为根本而成事于顺应自然。^[7]把人顺应自然的理念,当作治理天下的根本,其积极方面在于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应顺应自然而非违背自然规律,应学会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和而不处”。

三是聚焦工匠的职业道德理想。墨家虽未明确提出“以道驭术”的观点,但其传递的哲学思想十分重视职业道德规范对工匠的制约作用,把工匠的职业道德品质作为影响技术应用的关键。《墨子·公输》在宣扬“非攻”思想的同时,也阐明了墨子关于技术当“兼利天下”的主张。^[4]“兼利天下”既是墨家的政治主张,也是对技术发展的道德要求。“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

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纵使攻城器具机巧多变,仍败于守御之术。^[8]技术上的“非攻”是工匠职业道德品行的集中体现,是对技术监督管理者的道德责任与法律要求的要求。在墨家看来,“兼利天下”“非攻”已经不单指某个职业或某个工程应到达的高度,更是所有技术使用者毕生应追求的职业道理想,甚至从客观上看,将成为人类处理技术与社会关系应当遵从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其实质是一种群体的职业修养。

(二) 工程伦理教育的需求

在中国古代,匠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往往糅合于工程之中,如先秦时期大型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中使用的水量调节技术,秦汉时期宫殿建筑工程中木结构与砖结构技术等。^[9]技术和工程都是人类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为优质的生活而改造世界的活动。^[10]可以说,技术是工程的手段,支撑工程的实施;工程是技术的集成和载体,依赖于技术的发展。技术中面临的道德与利益冲突,通过“物化实体”的形式同样将反映于工程之中。当前,我国正深入实施工程教育改革,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全社会对工程人才在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处理工程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工程伦理教育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引导工程师能够积极关注科学、技术与工程实践中面临的道德选择和困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真正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中的新工科人才。这就需要工程师具备三种意识,即工程伦理教育的实际需求。

一是问题意识,即发现、分析及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意识。发现,就是能识别判断出工程伦理问题,知道面临工程伦理问题的对象以及出现问题的各种情况等。分析,就是能分析工程伦理问题的性质、特点及产生的原因;解决,是要把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原则、基本思路运用到实际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将人道主义、社会公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融入伦理意识培养、问题化解、综合决策、修正优化、建立制度等环节,有效处理工程与人、社会及自然的关系。问题意识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个人道德水平在工程实践的反映。工程师的道德水平受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共同影响,也受社会环境制约,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是个体素养的表现。因此工程伦理教育中的“问题意识培养”其实质就是个体伦理素养的提升。

二是整体意识,即将工程活动的参与者视为相互作用的行动者网络,即“工程共同体”^{[10]8}。在工程各环节,不同的工程主体在专业及应用领域各自发挥作用,独立影响着工程的各环节效果。同时,某环节的主体与其他环节的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关系网络形成影响“力场”,最终成就工程的整体效果。例如,工程设计环节,设计师作为主体,在设计环节必须考虑工程建设者的施工可行性以及工程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在该网络中,工程师必须能够协调各方关系,从整体上考虑工程的社会效应。“整体意识”要求工程师以自身为原点,在工程范围内织好与“自身之外”的关系网,公平公正地协调各方关系及利益,对工程师的协调能力提出了要求。

三是生态意识,即关注生态环保问题。工程是改造自然的活動。大型工程的实施,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工程和环境构成了现代工程的一对矛盾。^{[10]22}工程师在实施工程项目过程中,必然面临工程与环境的矛盾问题,由此产生环境相关的伦理道德抉择。其背后,是工程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的博弈在工程师意识中的反映。工程师的生态意识,其本质是生态保护下的工程利益最大化意识,也就是在环境所能容忍的相对最低限度上谋求工程的最大普惠性,把发展和环保之间的平衡掌握到极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健康积极的生态意识是工程实践主体在工程全过程中必须始终贯穿的思想观念,是工程师保持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三) “供给集”与“需求集”的形成

“以道驭术”和工程伦理教育各自呈现出反映不同思想观点的元素,这些元素相互独立,组成了关于“以道驭术”和工程伦理教育的要素“集合”。集合的产生是组织功能显现的前提,人们对两种集合存在的意义和功能有所期待。把“以道驭术”核心要义组成的集合定义为“供给集”,集合中包含以“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等墨家思想为代表的关于工程师群体的职业修养,以“重义而轻利”“聚义成仁”等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义利观,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道家思想为代表的生态观等思想

观点。“供给集”体现出中国传统科技思想蕴含的“能量”，人们关心的是这种“能量”最终将释放于何处，满足怎样的需求。需求具有时代性，新时代的工程人才在面对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周期长、风险大的现代复杂工程时，正需要通过汲取传统科技思想的“正能量”，获得解决工程难题的伦理“供给”，以践行工程师职业道德，增进全人类福祉。把工程伦理核心要义组成的集合定义为“需求集”，包含工程伦理教育核心要义中三种意识所折射的工程师个人伦理素养，即伦理责任、工程价值观、职业美德；协调工程体各方关系的能力，即公正的态度和利益协调方式；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即维护人类健康、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等思想观点。“需求集”反映的是中国当代工程伦理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人们探究的是这种“动力”的能量来自何处。显然，“供给集”的“能量”与“需求集”的“动力”之间，似乎存在一定供需关系，能使两个集合互相匹配，连结为共同产生效能的“关系体”，而这种关系，需要进一步验证和表征。

二、传统科技思想与工程伦理教育的“价值映射”

映射是现代数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两个非空集合 A 和 B ，如果存在一个法则 f ，使得对于集合 A 中的每一个元素 a （集合 A 的“遍历性”），按法则 f ，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元素 b （集合 B 的“唯一性”）与之对应，称 f 为从 A 到 B 的映射，记作 $f: A \rightarrow B$ 。其中， b 称为元素 a 在映射 f 下的像， a 称为 b 关于映射 f 的原像。借助“映射”概念，通常可以表征集合之间的特殊对应关系。鉴于“供给集”和“需求集”间供需匹配关系的假设，考察用“映射”来表征体现“需求”决定“价值”的思想，并将这种映射定义为“价值映射”，它为建立工程伦理“需求”与“以道驭术”“价值”间的决定性关系提供一种指向性的力量，即推动“需求”指向“价值”。因此，不妨设想“需求集”与“供给集”之间的匹配，可以在“价值映射”的模型中得以实现：工程伦理教育的需要决定了“以道驭术”思想在工程伦理教育领域的价值所在。然而，工程伦理教育的“需求集” A 与“以道驭术”科技思想的“供给集” B 能否成为映射关系，需要考察三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确定的“对应法则 f ”，二是集合 A 的“遍历性”，三是集合 B 元素的

“唯一性”。

（一）“价值映射”的对应法则探析

“以道驭术”作为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其当代价值的体现需要从“供需机制”上去探寻。换言之，“供给集”的价值，需要“需求集”通过特定的变换规则得以体现，而这种变换规则或对应法则就是“道德跃迁”机制，即从强调个体行为规范内在调节作用（个体自身）的微观、局部道德层面，向强调个体行为规范外在调节作用（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宏观整体道德层面的跃迁。工程伦理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工程师的道德水准、伦理素养及社会责任感，试图从个体的、主观的、封闭的“静态德性”培养转变为社会的、客观的、开放的“动态规范”培养，即工程师要掌握更一般、更具普适性的“规范”，获得一种“实践的明智”，即分析工程实践活动伦理冲突的实质的能力^[11]。这与一般的道德品行教育有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需要从“更高道德维度”去思考和解释其中的理论和案例。以“以道驭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科技思想正是从社会的、客观的角度来理解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导“共同体”应该怎么做，体现一般的“规范”，是高道德维度的反映。因此“以道驭术”提供的是思想集，与工程伦理的需求是匹配的，具备跃迁的动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新时代的中国工程伦理教育正需要从关注“个体道德”转向关注“工程共同体道德”，实现道德从低维度到高维度的跃迁。也就是说，“需求集”中的元素，在“道德跃迁”的对应法则下，能在“供给集”中探求到相应的思想元素予以支持，从而使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在工程伦理教育中实现当代价值。

（二）“需求集”的“遍历性”验证

在映射中，要求集合 A 中任意元素（原像）都要与集合 B 中的“像”存在对应关系，即“需求集”中的任意一个元素都要参与到“价值映射”的关系中。从上文知，“需求集”包含工程师个人伦理素养、协调工程共同体各方关系的能力及生态保护意识，也即现代复杂工程对新时代工程人才的基本规范要求。工程伦理素养的实质是工程师道德抉择的能力，其核心依然是道德修养问题，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修养通过工程实践，附加社会文化背景，形成工

程伦理素养。而“以道驭术”之“道”,符合上文所提的“道德”语境。协调工程体各方关系的能力,关键在于以工程社会效果为根本,体现工程造福人类的价值。“工程造福人类”是伦理学功利论的实践体现,也是中国儒学“天下归仁”思想的现实应用。把“仁爱”之心融于工程,更是“以道驭术”的逻辑起点和终点。生态保护意识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反映,是老庄思想中的核心要义。当然,“顺应自然”的当代价值指向应是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平衡,而非“无为”。但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界抱有的敬畏之心,根源依旧是“道法自然”。因此,“需求集”中任意一点指向工程实际的“诉求”“原像”,都能在“供给集”中找到“应求”之“像”。

(三)“供给集”的“唯一性”构造

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基本观点在特定方面是互通互融的,并非孤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既是“道法自然”的体现,也是“天下归仁”的意蕴所在。有别于数理分析中映射“唯一性”的应然属性,“供给集”的唯一性需要特别构造。换言之,“以道驭术”之“价值映射”的实现是需要付出额外努力的。“价值映射”唯一性构造的可操作性在于:传统科技思想的“价值”并非其本质所

有,不具“应然”性,需要结合当代之实际需求与其呼应,是“实然”所需。因此,从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中凝练出满足“实然”需求的有价值的思想,成为实现“价值映射”的必然动作。凝练的过程,就是构造“唯一性”的过程,即高度归纳出最简洁有效、最具代表性的要义,以期形成“以道驭术”思想的基本骨架及清晰脉络,使精准对应实际需求。因此,前文所述之“供给集”所凝练的“品德修养”“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承载的是“以道驭术”思想的基本构架,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保证了“需求集”元素在“对应关系 f”下的唯一指向。

在“道德跃迁”法则下,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个人伦理素养”吸收“以道驭术”中的职业道德理想之能量,向“职业群体修养”跃迁;“协调工程各方关系”受“义利对社会影响”的浸润,向工程领域的“义利观”跃迁;“生态保护意识”在“人类与自然相处之道”的渲染下,向“生态观”跃迁。三种跃迁协同推动工程伦理教育“需求集”指向“以道驭术”“供给集”的价值映射,实现“以道驭术”科技思想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价值反映。“以道驭术”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价值映射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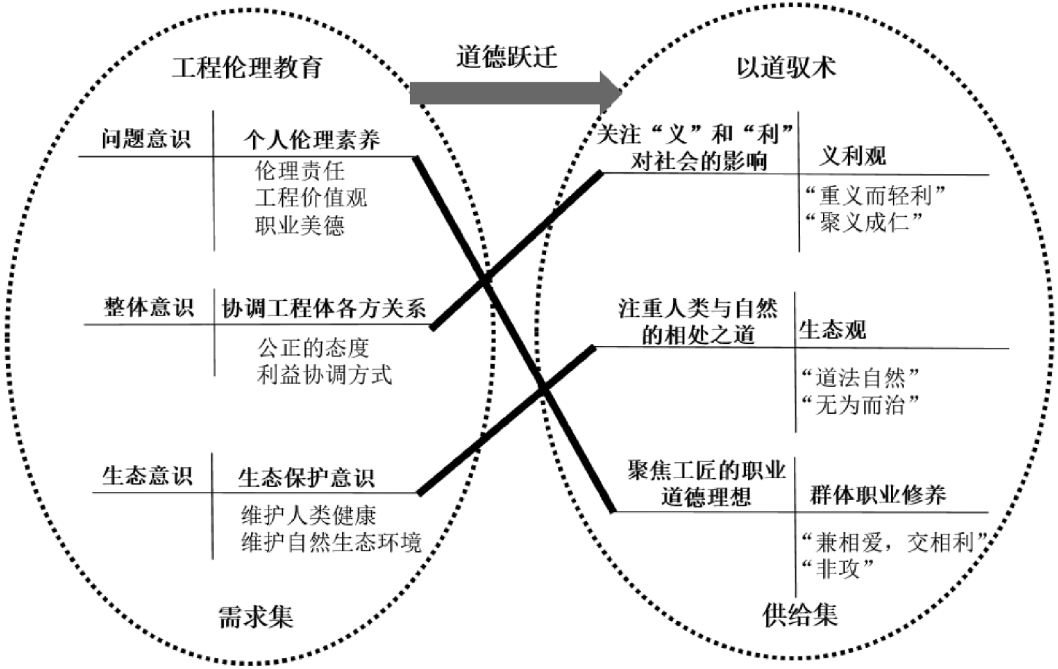


图 1 “以道驭术”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价值映射关系

Fig.1 Value mapping relationship of “Controlling Technology by Tao” i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三、“价值映射”的显性功能

从欧美工程伦理研究的进路中不难看出,各国工程伦理教育都具有大体一致的基本原则和培养目标,但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看,却有着不同的体现各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教育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必然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出现不适应、效果不佳、“水土不服”等问题,最终使我国培养的工程师在国际舞台失去竞争力,丧失发展主动权。因此,“价值映射”的作用就在于使“以道驭术”思想在当代中国工程伦理教育领域具备现实价值,从而发挥工程伦理教育在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显性功能,让“工程大国”走向“工程强国”。

(一) 扎根中国大地,解决本土实际问题

解决工程实践中具体伦理问题,仅依靠工程师伦理意识是不够的。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要从人、技术、环境等要素分析,更要在工程项目所浸润的社会文化中考察。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不同,产生的工程伦理问题理应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历史较长,经验丰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然而,西方工程伦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解决西方实际工程问题,对于思维方式、社会制度、民族特性等方面迥异不同的中国,完全西化的工程伦理教育对解决中国的工程问题是否有效,是值得商榷的。在处理个体与集体、人与自然、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等关系的问题时,需要紧密结合国情、社情和民情,需要充分考虑传统、风俗和习惯。也就是说,解决本土工程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应回归本土蕴含的思想文化,本土工程伦理教育的旨归,仍应落在解决本土实际问题之上。“以道驭术”通过“价值映射”所绽放出的价值光彩,为工程伦理教育本土化带来生机。

(二) 立足传统文化,增强国家科技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2]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在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等方面折射出的熠熠光辉不仅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山水田园,更为漂泊于茫茫大海的世界之船指明了前进的航向。事实上,秉承“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理念的中国古代

科学,其思想刻度一直标记于具体技术之中,是“搭乘”技术之“母机”上的科学,紧随人类生产生活,镌刻时代发展印记。正因为具备较为完整的“农医天算”科学体系以及超越时代的科技思想,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才会对后来的西方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带来深刻变革,这些古代科技所蕴含的思想(包括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同样深远。因此,把价值丰厚的传统科技思想融入中国大学的工程伦理教育之中,从传统文化立场去审视工程伦理教育,将成为增强民族科技自信的有力抓手。

(三) 构建话语体系,完成民族复兴使命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百年来,党始终坚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立足中国现实的原创性理论,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炼立足中国经验的标识性话语,加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培养立足中国问题的理论人才。^[13]工程伦理教育源于西方,但不能止于或囿于西方。在中国开展工程伦理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把中国的传统优秀科技思想和中国经验运用到育人全过程,用有民族特色的“标识性话语”论说扎根中国大地的工程伦理教育,用有民族气节的“学术话语”概述体现中国思想的工程伦理教育,用有民族个性的“人才培养”反馈聚焦中国实际的工程伦理教育。“以道驭术”的价值映射,为工程人才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聚点,也会因更具时代性的探究带来更多传统科技思想的价值光芒。

四、结语

中国高校的工程伦理教育要立足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以解决中国本土实际问题。传统思想能否为当代教育表达“中国话语”,关键在于思想的价值。价值由需求决定,并通过“映射关系”发挥价值效能。“以道驭术”思想的“供给集”与工程伦理教育的“需求集”在对应法则“道德跃迁”的作用下,通过“价值映射”的表征,将“个人品德修养、共同体间关系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传统元素”融入当代中国工程伦理教育,为增强民族科技自信,构建工程教育中国话语体系开辟理论探索的新进路。未来,借助不断趋于优

化的“价值映射”表征,发掘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以及文化领域更多价值点以解决本土问题,为建设中国话语体系贡献才智,将成为新征程上人们孜孜以求的新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大椿.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55.

[2] 胡萱, 胡小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实现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14): 64-66.

[3] 王前. “以道驭术”的内涵与价值: 答陈云的相关商榷文章[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31(1): 125-127.

[4] 王前. “以道驭术”: 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8, 30(1): 8-14, 110.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 简体字本[M]. 2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43.

[6] 方勇.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76.

[7]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89.

[8] 墨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2.

[9] 杜石然, 范楚玉, 陈美东, 等.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1, 124.

[10] 李正风, 丛杭青, 王前, 等. 工程伦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吴国林. 自然辩证法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119.

[12]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EB/OL].[2022-07-1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7/15/c_1128830256.htm.

[13] 崔唯航.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实现“中国化”[J]. 人民论坛, 2018(34): 29-31.

(责任编辑: 王圆圆)

(上接第 161 页)

[8] 王娟, 来守英, 程红. 关于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的探究: 以日照市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 (16): 58-61.

[9] 刘黎. 曲靖革命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研究[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9(5): 85-89.

[10] 龙金菊, 梁正海.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中红色革命遗址保护与利用: 基于贵州石阡困牛山红色革命遗址的考察与思考[J]. 铜仁学院学报, 2022, 24(4): 39-49.

[11]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通知[EB/OL].[2021-12-24].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31/content_5665933.htm.

[12] 许东. 乡村振兴视域下山东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路径[J]. 人文天下, 2021(11): 66-70.

[13]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EB/OL].[2021-03-25]. www.gov.cn/xinwen/2021-03/25/content_5595687.htm.

[14] 张国昌, 胡赤弟. 场域视角下的高校协同创新模式分析[J]. 教育研究, 2017(5): 55.

[15] 曹兵武. 生态文明视角下历史文物在现代社会的再脉络化: 兼论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有关问题[J]. 东南文化, 2020(3): 13-22, 189, 191.

(责任编辑: 王圆圆)